

#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是否影响发展韧性?

——以产业扶贫为例

狄灵瑜,侯婷婷,徐毅哲

(浙江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产业扶贫作为特定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特别强调产业发展与精准扶贫的深度融合。这不仅有助于改善扶贫地区面貌,也会对企业自身资源配置和营商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产业扶贫是否有助于提升企业发展韧性?选择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样本,实证研究产业扶贫行为对企业发展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积极参与产业扶贫的企业在经济走势下行期表现出更强的发展韧性。第二,产业扶贫主要通过夯实实业基础、赢得政府支持和缓解融资约束的路径增强了企业发展韧性。第三,在实体投资环境不佳、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以及民营企业中,这一效应会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从发展韧性的视角进一步肯定了企业开展产业扶贫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产业扶贫;发展韧性;融资约束;实业经营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049(2025)01-0067-12

DOI:10.20211/j.cnki.jnufe.2025.01.002

## 一、引言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两个不同的宏观战略,但两者之间又存在内在衔接机制。脱贫攻坚的实践成果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在诸多扶贫方式中,产业扶贫是一种国家大力提倡的“造血式”扶贫方式,强调产业发展与精准扶贫的深度融合。因此,产业扶贫的先行探索为乡村振兴奠定了物质基础,并为乡村振兴积累了宝贵经验。

鉴于扶贫战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艰巨任务和产业发展的内在特性,这一战略的实施需要地方政府动员并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尤其离不开企业的积极参与<sup>[1]</sup>。2019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引导工商资本到乡村投资兴办农民参与度高、受益面广的乡村产业”。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要“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主体,上市企业积极响应中国证监会的号召,认真落实国家战略部署,扎实推进扶贫工作,成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根据沪深交易所的统计,以2020年为例,该年沪市主板上市企业中,有超过一半的企业参与了扶贫工作,投资资金及物资合计近600亿元,惠及人数达150万余人次;科创板上市企业中,有69家企业通过产业扶贫、对口支援等方式帮扶困难地区和贫困群众;深市上市企业中,有685家企业披露了精准扶贫工作信息,投入资金合计约370.8亿元。参与规模、帮扶

收稿日期:2024-06-10;修回日期:2024-12-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潜在动机和激励机制研究”(22BYJ207)

作者简介:狄灵瑜(1981—),女,浙江温州人,通讯作者,管理学博士,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企改革和公司治理;侯婷婷(2003—),女,安徽亳州人,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企改革与公司治理;徐毅哲(2002—),男,浙江嘉兴人,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企改革与公司治理。

范围和投入力度之大前所未有<sup>①</sup>。过去,上市企业扶贫的深入推进有力促进了我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今后,这一经验必将成为巩固脱贫成果及乡村振兴的重要借鉴。

已有文献从企业日常经营、投资决策和筹资行为等角度充分肯定了产业扶贫的重要性。当前世界正经历瞬息万变的局势,如何在不确定性环境中维持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是所有企业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不仅需要合理的制度安排,更需要企业自身具备强大的韧性。因此,作为企业在特定时期内的社会责任表现,产业扶贫行为能否帮助企业渡过危机、提升企业发展韧性?如果能,其是否具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作用机制?为此,本文选择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共计18312个企业—年度样本,实证检验了产业扶贫参与对企业发展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在经济下行期,积极参与产业扶贫的企业表现出更好的发展韧性。第二,机制分析表明,企业参与产业扶贫主要通过提升实业比重、赢得政府支持和缓解融资约束的路径,笃实企业发展基础并争取更多外部资源,从而增强了企业发展韧性。第三,这一效应在实体投资环境不佳、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和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

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本文丰富了现有文献中关于企业发展韧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有文献从企业自身特征、企业与组织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以及企业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等角度探讨了企业发展韧性的潜在影响因素。而本文结合我国扶贫战略,从产业扶贫行为这一特殊的社会责任视角出发,研究发现产业扶贫参与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发展韧性。第二,在机制分析方面,本文深入探讨了产业扶贫行为对企业发展韧性的作用机制,证实了开展产业扶贫能够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改善政企关系、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企业应对外部不利环境的能力。这一结论进一步强调了企业参与产业扶贫并向乡村振兴过渡的积极意义。第三,本文拓展了企业开展产业扶贫的经济后果研究,将其延伸至发展韧性视角,肯定了在经济下行期这一行为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效应。

## 二、文献综述

### (一) 企业发展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发展韧性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自身的战略选择、治理机制等因素<sup>[2-3]</sup>。一方面,不同的战略选择会对企业发展韧性产生差异化影响。当企业采用国际化战略时,该战略所带来的知识和资源可以用来开发新的惯例或调整旧的惯例,从而提高企业发展韧性<sup>[4]</sup>。当企业坚持开拓创新时,该战略能提升企业竞争优势,增强发展韧性<sup>[5]</sup>。而当企业选择数字化转型战略时,数字化可以通过增加工作灵活性、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强化内部控制水平,进而提高企业在危机期间的发展韧性,表现为数字化企业在危机期间获得的股票收益率更高,尤其是小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sup>[6]</sup>。从供应链角度来看,下游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优化供需匹配、稳定供需关系、提高供应商创新能力三个层面增强产业供应链韧性,进而推动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sup>[7]</sup>。另一方面,从治理视角出发,高强度的政府审计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都能有效促进企业发展韧性的提升<sup>[8]</sup>。组织内和组织间的关系网络也可以通过促进创新的路径,提高企业发展韧性<sup>[9]</sup>。也有学者关注到管理层内部,研究发现管理者的领导力有利于企业更好地应对复杂环境,强化组织韧性<sup>[10]</sup>。除此之外,改善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关系是提升企业发展韧性的又一有效途径。有研究发现,企业前期的社会责任投入能够改善其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包括供应商忠诚、债权人信任及股东支持等,从而在关键时刻帮助企业渡过危机,最终提升企业发展韧性<sup>[11]</sup>。另外,企业发展韧性也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良好的投资者保护制度能通过扩大融资渠道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应对危机的能力<sup>[12]</sup>。

### (二) 企业扶贫的经济后果研究

大多数研究充分肯定了企业扶贫的积极意义。对于被扶贫对象而言,企业扶贫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尤其是在西部地区和国家级贫困县,企业扶贫的效果会更为显著<sup>[13]</sup>。扶贫的空间关联网外部性能够产生一定的减贫效应,聚焦于连片特困区时,扶贫网络的减贫效应会更为明显<sup>[14]</sup>。

<sup>①</sup>图解: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脱贫攻坚“成绩单”,资料来源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0521/c1004-32109954.html>。

对于企业自身而言,企业扶贫会直接影响到其日常经营、投资、筹资行为和治理机制。在经营行为方面,企业扶贫能显著提高企业声誉、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企业风险<sup>[15]</sup>,提高经营业绩<sup>[16]</sup>,并创造出共享价值<sup>[17]</sup>。在投资行为方面,企业扶贫会影响其投资活动的安排,如创新投资和金融投资等。具体来说,虽然扶贫支出会部分挤占创新投入资金,但这种挤占并非坏事,因为企业获得的专利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升<sup>[18]</sup>。关于金融资产投资,钱爱民和吴春天<sup>[19]</sup>研究发现,产业扶贫会促进企业主营业务的发展,从而降低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在筹资行为方面,企业扶贫作为响应政府号召的社会责任行为,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包括政府补贴<sup>[20-21]</sup>、商业信用<sup>[22]</sup>以及债务融资规模<sup>[23]</sup>。在治理机制方面,企业扶贫是企业与外部环境互动的重要形式,有助于提升合法性,提高企业信心<sup>[24]</sup>,增加信息透明度,吸引媒体关注,进而发挥治理效应<sup>[25]</sup>。

企业参与扶贫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产业扶贫、转移就业和易地搬迁等。在这些方式中,产业扶贫是我国长期扶贫开发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种专项扶贫开发模式。产业扶贫是指依托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要素禀赋以及经济水平等现实条件,政府通过注入扶贫资金,帮助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发展产业,通过产业发展带动人口脱贫的一种扶贫方式<sup>[26]</sup>。产业扶贫的内在逻辑在于通过发挥产业支撑的保障作用,形成产业发展与精准扶贫的深度融合,不断壮大地域内部的主导产业,有效解决因贫困带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帮助广大贫困群体努力发展产业,增强自我造血的能力。形式上,产业扶贫主要包括产业发展带动扶贫模式、瞄准性产业帮扶模式和救济式产业帮扶模式三种形式。

与本文主题相近的是郝颖等<sup>[11]</sup>的研究,探讨了社会责任履行如何影响企业发展韧性。本文聚焦于产业扶贫这一特殊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探讨其对企业发展韧性的影响。虽然产业扶贫行为也属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但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参与产业扶贫不仅是造福贫困地区的重要举措,也是企业扩大发展的新机遇,更是其履行重要政治任务的体现。因此,与一般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相比,开展产业扶贫对企业发展韧性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化的典型特征?这正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是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企业的积极和持久参与是不可或缺的。在各种扶贫方式中,产业扶贫是我国长期扶贫开发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种专项扶贫开发模式,尤其需要企业的积极参与。对于企业而言,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与产业扶贫,不仅可以造福于贫困地区,为实现小康社会做出贡献,同时也能为企业自身带来正向反馈。尤其是在宏观经济相对不景气的情况下,积极参与产业扶贫的企业能有效抵御外部经济下行压力,确保盈利能力和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并持续推动创新。企业的扶贫行为主要通过以下三条途径增强企业发展韧性。

其一,笃实实业经营。实体经济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在当前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下,坚持发展实体经济,以实业为本凝聚增长动力,是有效应对各种内外部冲击、提升发展韧性的重要支撑。然而,由于当前实体经济持续低迷,管理者面临多重压力。既有债务偿还、满足股东回报等外部压力,也有自身职位晋升和业绩薪酬考核的内部压力。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短视的管理者更可能将原本用于实体经营的资金配置于金融资产,即“脱实向虚”。可以合理预期,当企业实体经营效率提升时,企业持有较高金融资产的必要性将大大减少,进而转向发展实业。产业扶贫行为能显著提升企业实体经营绩效,进而强化企业发展韧性。一方面,产业扶贫是最为典型的造血式扶贫,强调在尊重市场交易和产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重新配置要素资源,赋予贫困人口发展机会,加速其恢复生产能力,获得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对于开展产业扶贫的企业而言,产业扶贫行为不仅满足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需要,还能为企业赢得丰富的地区特色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包括贫困地区特有的自然资源以及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企业可以进一步结合自身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出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扶贫产品,为企业带来较高的主业经济效益<sup>[16]</sup>。而企业实体经营业绩的改善可引导其配置更多的资金发展实业,从而有效提升企业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增强企业发展韧性。

其二,赢得政府支持。扶贫战略是党和国家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

举措,是一项特殊的社会责任,具备政治高度和政策强度。这使得其本质上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慈善捐赠等社会责任。企业开展产业扶贫不仅是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更是其承担重要政治任务的体现。在某种程度上,特定时期企业参与产业扶贫的核心意义并不在于投入金额的高低,而在于其所释放的政治信号。即使企业在产业扶贫上的投入额不高,但这仍是配合实施国家扶贫战略、为政府排忧解难的重要体现。虽然产业扶贫可能增加了企业的短期成本,但却能为企业赢得良好的政治声誉,取得社会效益。转型期中国,政治认可对任何企业都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更多来自宏观政策层面的内部信息,实现尽早布局生产经营决策,合理调配企业资源,以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此外,政治认可还可以为企业争取更多的政策性资源,使其能在不利环境下做出积极应对,同时它为企业提供隐性担保,释放积极信号,表明企业受到政府支持,从而提高企业获得优惠政策的概率,降低经营风险,增强其发展韧性<sup>[27-28]</sup>。

其三,缓解融资约束。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加速了企业风险,企业必须具备动态调整发展战略的能力,持续整合资源以适应环境。因此,充裕的资金是提升企业发展韧性的重要保障。一般而言,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资本市场和供应商等。从银行角度来看,在我国金融抑制程度较高的环境下,银行在信贷契约的谈判中处于优势地位<sup>[29]</sup>。为了能有效控制信贷风险,银行通常不愿意向存在违约风险隐患的企业提供信贷资金<sup>[29-30]</sup>。而企业的产业扶贫行为可以增加消费者的忠诚度,吸引更多具备社会责任感的消费者,从而带来销售收入的增长,改善企业经营能力,减少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提高企业偿债能力。此外,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内部经营良好且具备一定的道德责任,这有利于提高企业信用评级,为企业按期还款提供保障,使银行更愿意提供资金。从资本市场角度来看,资本市场的投资者通常不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有助于降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2016年,证监会及沪深交易所颁布相关文件,对扶贫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方式进行规范。在扶贫攻坚取得胜利之前,企业的产业扶贫及其他精准扶贫行为的信息披露相对规范,这有助于在资本市场上有效传递企业的实力和发展前景,提高企业声誉,增强投资者信心,从而获得积极的资本市场效应,有利于权益资本的获取<sup>[31]</sup>。从供应商角度来看,企业在买卖商品过程中以商品形式提供的借贷活动也是资金的重要来源。已有文献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重要的信号作用,能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同,显著增加媒体报道的数量,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声誉<sup>[32]</sup>。而扶贫战略是特定时期中央政府的重要战略部署。企业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投入物资或资金以帮助贫困地区脱贫时,更容易被社会视为有担当的举措,从而提升企业影响力,赢得供应商、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认可,推动企业销售收入的快速增长。这有利于促进企业与供应商建立互利互惠、持久稳定的合作关系。当经济走势下行时,供应商仍然会愿意为企业提供稳定而高效的商业信用,这相当于为企业提供了另一资金渠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企业在不利环境下积极应对的资源需求,促使企业韧性发展。总之,无论是资金来源于银行、资本市场还是供应商,都能有效缓解融资约束,为企业在不利环境下的积极应对提供资源基础,促进企业韧性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积极参与产业扶贫的企业在经济走势趋缓或下降时会表现出更强的发展韧性。

#### 四、研究设计

##### (一) 样本和变量设计

本文选取2016—2020年度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sup>①</sup>。选择这一期间主要是因为,2016年9月,证监会发布了《中国证监会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对上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给予了支持和鼓励。随后,沪深交易所分别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扶贫工作信息披露的通知》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扶贫工作信息披露的通知》,全面细化了上市企业扶贫相关社会责任工作的信息披露要求。直至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

<sup>①</sup>由于本文在构建盈利稳定性、业绩增长性、融资水平稳定性指标采用的 $(T-1, T+1)$ 区间,因此,在计算2016年和2020年相关指标用到了2015年和2021年的数据。

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因此,本文将样本期间限定为2016—2020年。此外,本文剔除了金融行业企业以及在CSMAR数据库中无法找到相关数据的企业,最终选取了18 312个观察值。同时,为避免异常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对主要连续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了WINSOR缩尾处理。本文所有变量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 (二)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企业发展韧性。根据企业发展韧性的内涵,韧性强代表企业能够在多变局势下可“以变应变”,借助外部机遇,降低外部冲击对企业经营的负面影响。具备发展韧性的企业意味着尽管面临外部下行压力,仍能保持稳健性和灵活性。参照郝颖等<sup>[11]</sup>的做法,本文采用以下三个指标来综合衡量企业发展韧性。(1)盈利稳定性(*STDROA*)和业绩增长性(*DSALE*)。对于盈利稳定性(*STDROA*),参考以往文献,本文以三年为一个观测周期( $T-1$ 、 $T$ 、 $T+1$ ),计算企业在每个观测周期内经行业调整的*ROA*的标准差,以衡量企业盈利稳定性。该指标值越小,说明企业收益率越稳定,企业发展韧性越强。对于业绩增长性(*DSALE*),本文仍以三年为一个观测周期( $T-1$ 、 $T$ 、 $T+1$ ),计算企业在每个观测期内累计销售收入增长率,以衡量业绩增长性。该指标越大,说明企业主营业务增长越快,企业发展韧性越强。(2)融资稳定性(*STDLEV*)。参照盈利稳定性的计算方法,以三年为一个观测周期( $T-1$ 、 $T$ 、 $T+1$ ),计算企业在每个观测周期内经行业调整的资产负债率的标准差,以衡量企业融资水平的稳定性。该指标值越小,说明企业融资水平越稳定,企业在危机中自我恢复的能力越强。(3)企业创新能力(*PAT*)。前两个指标强调稳健性,而企业发展韧性除了稳健性要求之外,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应对能力。这要求企业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能进化为更高的创新水平。因此,本文将企业专利申请数加1的自然对数值作为衡量企业创新水平的指标。

2. 解释变量:产业扶贫投入(*PRO*)。本文使用产业扶贫投入(*PRO*)来衡量企业产业扶贫投入水平,衡量方法是企业年度产业扶贫支出额占总资产比值乘以1000。

3. 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本文主要控制以下控制变量,具体定义详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盈利稳定性	<i>STDROA</i>	经行业调整的 <i>ROA</i> 的标准差
	业绩增长性	<i>DSALE</i>	企业( $T-1$ 、 $T+1$ )观测期内累计销售收入增长率
	融资稳定性	<i>STDLEV</i>	经行业调整的 <i>LEV</i> 的标准差
	企业创新能力	<i>PAT</i>	企业专利申请数加1的自然对数值
解释变量	企业景气度	<i>DURING</i>	以企业景气度指数中位数为界,若小于中位数取值为1,否则为0
	产业扶贫投入	<i>PRO</i>	企业年度产业扶贫投入额占资产总额比重乘以1000
	规模	<i>SIZE</i>	企业总资产的对数值
	成长性	<i>GROWTH</i>	(企业当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
控制变量	经营现金流	<i>CF</i>	当年经营活动现金净额/期末资产总额
	股权集中度	<i>H1</i>	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
	独立董事占比	<i>INDR</i>	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
	资产负债率	<i>LEV</i>	企业负债与资产的比值
	企业业绩	<i>ROA</i>	企业年度净利润与总资产余额的比值
	固定资产占比	<i>PPE</i>	固定资产净值与资产总额之比
	企业年龄	<i>AGE</i>	企业上市年限加1的自然对数
	产权性质	<i>STATE</i>	国有产权取值1,否则为0
	托宾 <i>Q</i>	<i>Q</i>	企业市值与资产总额之比
	年度效应	<i>YEAR</i>	年度虚拟变量
	行业效应	<i>IND</i>	行业虚拟变量

## (三) 模型设计

为探析产业扶贫投入对企业发展韧性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Y_{i,t} = \beta_0 + \beta_1 PRO_{i,t} + \beta_2 DURING_{i,t} + \beta_3 FRO_{i,t} \times DURING_{i,t} + \beta_4 Controls_{i,t} + \sum IND + \sum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Y_{i,t}$  表示企业发展韧性,具体包括盈利稳定性( $STDROA$ )、融资稳定性( $STDLEV$ )以及企业创新能力( $PAT$ ), $PRO$  为产业扶贫投入, $DURING$  为企业景气度指数的虚拟变量, $FRO \times DURING$  为核心解释变量, $Controls$  为控制变量,并控制了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

##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由结果可知:盈利稳定性( $STDROA$ )的均值(中位数)为0.03(0.01),业绩增长性( $DSALE$ )的均值(中位数)为0.42(0.22)、融资稳定性( $STDLEV$ )的均值(中位数)为0.16(0.08),企业创新能力( $PAT$ )的均值(中位数)为0.54(0.00),说明全样本企业创新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样本期间内,企业是否参与产业扶贫( $D\_PRO$ )的均值(中位数)为0.12(0.00),表明约12%的企业参与了产业扶贫。产业扶贫支出额( $PRO$ )的均值(中位数)为0.04(0.00),表明从全样本来看,企业产业扶贫支出占总资产比值( $\times 1000$ )的均值为4%。同时,仍有大量企业尚未参与产业扶贫,显示出较大提升空间。其余变量信息详见表2。另外,相关系数矩阵显示,所有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20,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限于篇幅,相关系数矩阵未列出。

### (二) 基准回归结果

表3检验了产业扶贫行为对企业发展韧性的影响。利用模型(1),采用OLS回归,列(1)至列(4)分别以盈利稳定性( $STDROA$ )、业绩增长性( $DSALE$ )、融资稳定性( $STDLEV$ )和企业创新能力( $PAT$ )作为被解释变量。列(1)中, $PRO \times DURING$ 的系数( $T$ 值)为-0.009(-2.56),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意味着积极参与产业扶贫的企业,在经济走势下行时具有相对稳定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25分位数	中位数	75分位数	最大值
$STDROA$	0.03	0.05	0.00	0.00	0.01	0.03	0.36
$DSALE$	0.42	1.04	-0.81	-0.02	0.22	0.53	7.50
$STDLEV$	0.16	0.86	0.00	0.04	0.08	0.14	1.02
$PAT$	0.54	1.40	0.00	0.00	0.00	0.00	9.74
$PRO$	0.04	0.23	0.00	0.00	0.00	0.00	2.04
$D\_PRO$	0.12	0.33	0.00	0.00	0.00	0.00	1.00
$DURING$	0.60	0.49	0.00	0.00	1.00	1.00	1.00
$SIZE$	22.31	1.45	19.69	21.29	22.09	23.05	27.28
$LEV$	0.43	0.22	0.06	0.26	0.41	0.58	0.97
$GROWTH$	0.16	0.45	-0.68	-0.03	0.10	0.26	2.92
$CF$	0.05	0.07	-0.19	0.01	0.05	0.09	0.25
$H1$	0.33	0.15	0.08	0.22	0.31	0.43	0.73
$INDR$	0.38	0.05	0.33	0.33	0.36	0.43	0.57
$Q$	1.98	1.35	0.84	1.21	1.56	2.21	9.32

表3 产业扶贫行为与韧性发展:基准回归

变量	(1)	(2)	(3)	(4)
	盈利稳定性	业绩增长性	融资稳定性	企业创新能力
$PRO \times DURING$	-0.009*** (-2.56)	0.086** (2.05)	-0.153*** (-2.86)	0.141** (2.13)
$PRO$	-0.002 (-0.06)	0.046*** (2.76)	-0.018 (-0.71)	0.004 (0.06)
$DURING$	0.002*** (2.47)	-0.064*** (-5.05)	0.067** (2.12)	-0.170*** (-5.71)
$SIZE$	-0.011*** (-23.66)	0.047*** (11.49)	0.042*** (4.51)	0.147*** (15.97)
$LEV$	0.062*** (16.64)	0.082*** (3.17)		-0.233*** (-4.58)
$GROWTH$	-0.006*** (-4.60)		0.210*** (5.48)	-0.025 (-1.36)
$CF$	-0.040*** (-4.93)	0.217*** (3.02)	-0.541*** (-4.44)	0.161 (1.17)
$H1$	-0.026*** (-10.39)	-0.062** (-2.31)	0.080* (1.69)	-0.062 (-0.88)
$INDR$	0.035*** (4.77)		0.093 (0.76)	-0.220 (-1.21)
$PPE$		-0.175*** (-6.13)	-0.085*** (-2.63)	-0.062 (-0.86)
$ROA$		0.082** (2.10)	-0.034*** (-2.54)	0.006 (0.63)
$AGE$		-0.014*** (-3.17)	0.033*** (2.62)	-0.066*** (-5.57)
$RD$		-0.002 (-1.05)		
$DUAL$		0.011 (1.50)		
$BM$		-0.247*** (-11.90)		
常数	0.309*** (6.85)	-0.821*** (-3.60)	-0.931*** (-4.41)	-2.769*** (-13.51)
样本数	18 312	18 312	18 312	18 312
$F(P)$ 值	40.42 (0.00)	26.16 (0.00)	46.23 (0.00)	58.58 (0.00)
修正 $R^2$	12.76%	5.61%	13.18%	16.36%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的盈利能力。列(2)中, $PRO \times DURING$ 的系数( $T$ 值)为0.086(2.05),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积极参与产业扶贫的企业在经济走势下行时具有相对持续的业务增长能力。列(3)中, $PRO \times DURING$ 的系数( $T$ 值)为-0.153(-2.86),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意味着积极参与产业扶贫的企业在经济走势下行时具有相对稳定的融资水平。列(4)中, $PRO \times DURING$ 的系数( $T$ 值)为0.141(2.13),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积极参与产业扶贫的企业在经济走势下行时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综上所述,假说1得到验证。

## 六、稳健性检验

### (一) 工具变量法

产业扶贫行为与企业发展韧性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关系。本文采用样本企业所在行业上一年行业内除本企业外其他企业的产业扶贫投入均值作为该企业产业扶贫投入的工具变量。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在第一阶段Probit回归中,工具变量( $PRO\_IND$ )的系数( $T$ 值)为0.023(4.11),在1%水平上与内生解释变量显著正相关,同时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Anderson LM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Cragg-Donald Wald检验)。表4二阶段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似。

### (二) 固定效应

现实中可能存在一些观测不到的个体特征会对企业扶贫行为产生影响,本文采用固定效应回归以消除个体特征对模型估计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前文结论依然成立。

### (三) 变量替换

为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原解释变量 $PRO$ 替换为企业扶贫投入额的自然对数值,并重新利用模型(1)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前文结论依然成立。

表4 产业扶贫与韧性发展:工具变量法

变量	(1)	(2)	(3)	(4)
	盈利稳定性 <i>STDROA</i>	业绩增长性 <i>DSALE</i>	融资稳定性 <i>STDLEV</i>	企业创新能力 <i>PAT</i>
$PRO \times DURING$	-0.087** (-1.98)	3.899** (2.05)	-13.377*** (-3.13)	0.697*** (2.91)
$PRO$	-0.052 (-0.54)	2.091 (1.41)	7.107*** (3.11)	0.879 (0.36)
$DURING$	0.008*** (2.68)	-0.127** (-2.10)	0.145* (1.89)	-0.133* (-1.8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	0.306*** (11.56)	-0.501*** (-2.71)	-0.345 (-0.35)	-2.552*** (-3.27)
样本数	18 312	18 312	18 312	18 312
$F$ 值	79.28	26.16	16.11	48.11
修正 $R^2$	10.67%	5.61%	7.15%	14.42%
Anderson LM 值( $P$ 值)	13.623 (0.00)	3.912 (0.04)	4.606 (0.03)	3.798 (0.05)
Cragg-Donald Wald $F$ 值	13.61	14.34	15.909	13.74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表5 产业扶贫与韧性发展:固定效应

变量	(1)	(2)	(3)	(4)
	盈利稳定性 <i>STDROA</i>	业绩增长性 <i>DSALE</i>	融资稳定性 <i>STDLEV</i>	企业创新能力 <i>PAT</i>
$PRO \times DURING$	-0.009* (-1.75)	0.095** (2.11)	-0.080*** (-2.74)	0.078** (2.11)
$PRO$	-0.001 (-0.48)	0.031 (1.02)	-0.055 (1.03)	-0.103 (-1.34)
$DURING$	0.006*** (6.68)	-0.082*** (-7.95)	0.058*** (2.99)	0.001 (1.0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	1.061*** (34.75)	-9.364*** (-27.11)	-10.202*** (-16.69)	0.803 (1.06)
样本数	18 312	18 312	18 312	18 312
$F$ 值	95.37	50.29	17.76	94.63
修正 $R^2$	17.93%	12.27%	4.79%	9.75%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表6 企业扶贫与韧性发展:变量替换

变量	(1)	(2)	(3)	(4)
	盈利稳定性 <i>STDROA</i>	业绩增长性 <i>DSALE</i>	融资稳定性 <i>STDLEV</i>	企业创新能力 <i>PAT</i>
$LNPRO \times DURING$	-0.001** (-2.11)	0.002* (1.77)	-0.004** (-2.37)	0.012*** (3.62)
$LNRPPO$	-0.002** (-2.26)	0.002** (2.01)	-0.007** (-2.41)	0.030 (1.60)
$DURING$	0.002*** (2.55)	-0.074** (-2.20)	0.064** (2.03)	-0.189*** (-6.3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	0.307*** (6.80)	-0.750* (-1.90)	-0.553** (-2.26)	-2.465*** (-12.52)
样本数	18 312	18 312	18 312	18 312
$F$ 值	41.45	22.01	16.37	59.31
修正 $R^2$	12.66%	4.39%	8.17%	6.21%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 (四) 限定样本范围

将样本限定为曾经实施过扶贫行为的企业,并重新利用模型(1)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结论依然成立。

## 七、机制检验

## (一) 作用渠道

## 1. 笃实实业经营

前文理论分析表明,产业扶贫的参与可以为企业赢得丰富的地区特色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扶贫企业因此能获得竞争优势,扩大实业经营规模,提高主营业务的经营效益<sup>[16]</sup>,表现为实业投资规模的增加,金融资产投资规模的减少。表8中经济下行期产业扶贫行为对其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回归结果显示, $PRO \times DURING$ 的系数( $T$ 值)为 $-0.138(-2.04)$ ,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在经济下行期,积极参与产业扶贫的企业会配置更少的虚拟金融资产,转而扩大实业投资,以应对外部下行压力,提高企业发展韧性。

## 2. 赢得政府支持

已有研究表明,企业积极参与政府倡导的“万企帮万村”等精准扶贫活动是一种主动迎合政府的行为,这有助于实现政府的政治目标。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期,企业坚持产业扶贫的做法可以进一步增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任,帮助企业获取政策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经济下行的冲击<sup>[21,33]</sup>。表8中经济下行期产业扶贫行为对企业获取政府补助的回归结果显示, $PRO \times DURING$ 的系数( $T$ 值)为 $0.019(2.57)$ ,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在经济下行期仍积极参与产业扶贫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确保其韧性发展。

## 3. 缓解融资约束

企业参与产业扶贫可以传递积极信号,改变投资者或债权人对企业价值的预期,从而增强其获取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的能力,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而融资约束程度的缓解能增强企业抵御经济下行压力的能力,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表8中经济下行期企业扶贫行为对其融资约束程度( $KZ$ 指数)的回归结果显示, $PRO \times DURING$ 的系数( $T$ 值)为 $-0.041(-2.27)$ ,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意味着在经济下行期仍积极参与产业扶贫的企业可以有效缓解融资约束,确保证其韧性发展。

表7 产业扶贫与韧性发展:限定样本范围

变量	(1) 盈利稳定性 <i>STDROA</i>	(2) 业绩增长性 <i>DSALE</i>	(3) 融资稳定性 <i>STDLEV</i>	(4) 企业创新能力 <i>PAT</i>
$PRO \times DURING$	-0.010** (-2.24)	0.058** (2.31)	-0.175** (-2.09)	0.142*** (2.91)
$PRO$	-0.003*** (-3.02)	0.033* (1.82)	-0.033 (-1.05)	0.059* (1.81)
$DURING$	0.001*** (4.65)	-0.116*** (-5.59)	0.094 (1.42)	-0.008* (-1.7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	0.107*** (9.13)	-0.423*** (-3.17)	-1.205*** (-3.56)	-1.904*** (-3.65)
样本数	3 980	3 980	3 980	3 980
$F$ 值	19.76	7.92	14.93	18.06
修正 $R^2$	9.44%	4.67%	8.43%	8.89%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表8 企业扶贫与韧性发展:机制检验

变量	金融化水平 <i>FIN</i>		政府支持 <i>SUB</i>		融资约束 <i>KZ</i> 指数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PRO \times DURING$	-0.138**	(-2.04)	0.019***	(2.57)	-0.041**	(-2.27)
$PRO$	-0.033	(-0.89)	0.017***	(3.19)	-0.052*	(-1.68)
$DURING$	0.148**	(9.26)	-0.272***	(-5.29)	0.367***	(8.66)
常数	19.517***	(189.32)	-2.2893***	(-3.59)	3.768***	(6.88)
样本数	18 312		18 312		18 312	
$F$ 值	105.26		85.36		437.91	
修正 $R^2$	17.54%		21.97%		53.33%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 (二) 异质性检验

## 1. 实体投资环境

企业过度配置金融资产会导致发展韧性的不足。这种过度配置部分源于实体投资环境的持续恶

化。在实体投资收益率持续下滑的情况下,企业从事实体生产的积极性会显著减弱,持有更多的金融资产成为其替代选择。理论上,实体经营与金融业的利润差距越大,意味着企业在金融领域的资产配置套利空间相对越大<sup>[34]</sup>。此时,产业扶贫行为通过笃实实业经营降低过度金融资产配置,从而显著提高发展韧性。

参考于连超等<sup>[35]</sup>研究,本文采用金融行业的行业平均利润率与企业主营业务的利润率之差来衡量企业所面临的实体投资环境。两者差异越大,说明金融市场的套利空间越大,企业的实体投资环境相对较差。以中位数为界,将样本企业分为高套利组和低套利组。由表9的列(1)和列(2)可知, $PRO \times DURING$ 的系数( $T$ 值)在高套利组和低套利组中分别为 $-0.029$ ( $-2.24$ )和 $-0.019$ ( $-1.20$ )。这表明,当实体投资环境不佳时,企业倾向于配置更多的金融资产以获取市场利润,此时参与产业扶贫对抑制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效果更加显著。而当实体投资环境较好时,参与产业扶贫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抑制效果不显著。此外,列(3)至列(10)的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当实体投资环境不佳时,产业扶贫投入对提升企业发展韧性的效果更加显著,表现为更稳定的盈利水平、更稳定的融资水平和更高的创新水平。

表9 产业扶贫与韧性发展:实体投资环境

变量	金融化水平 $FIN$		盈利稳定性 $STDROA$		业绩增长性 $DSALE$		融资稳定性 $STDLEV$		企业创新能力 $PAT$	
	高套利 (1)	低套利 (2)	高套利 (3)	低套利 (4)	高套利 (5)	低套利 (6)	高套利 (7)	低套利 (8)	高套利 (9)	低套利 (10)
$PRO \times DURING$	$-0.029^{**}$ ( $-2.24$ )	$-0.019$ ( $-1.20$ )	$-0.007^{**}$ ( $-2.34$ )	$-0.008$ ( $-0.78$ )	$0.089^{**}$ ( $2.21$ )	$0.083$ ( $1.49$ )	$-0.196^{***}$ ( $-2.57$ )	$-0.117$ ( $-1.58$ )	$0.204^{**}$ ( $2.05$ )	$0.077$ ( $0.36$ )
$DURING$	$-0.005$ ( $-1.37$ )	$-0.022^{***}$ ( $-8.84$ )	$0.213^{***}$ ( $-6.40$ )	$0.002$ ( $0.99$ )	$-0.067^{***}$ ( $-3.23$ )	$0.172^{***}$ ( $10.84$ )	$0.060^{**}$ ( $2.09$ )	$-0.084^{*}$ ( $-1.71$ )	$-0.125^{***}$ ( $-2.93$ )	$-0.199^{***}$ ( $-4.41$ )
$PRO$	$0.005$ ( $0.54$ )	$-0.005$ ( $-0.80$ )	$0.001$ ( $0.23$ )	$-0.001$ ( $-0.22$ )	$0.065^{***}$ ( $2.70$ )	$-0.027$ ( $-1.35$ )	$0.046$ ( $1.23$ )	$-0.002$ ( $-0.07$ )	$-0.016$ ( $-0.16$ )	$0.006$ ( $0.07$ )
$FIN \times DURING$			$0.012^{***}$ ( $2.82$ )	$0.053^{***}$ ( $5.27$ )	$0.025^{**}$ ( $2.18$ )	$0.038$ ( $1.53$ )	$-0.174^{**}$ ( $-1.99$ )	$-0.103$ ( $-0.55$ )	$-0.084$ ( $-0.62$ )	$-0.045$ ( $-0.19$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	$0.045$ ( $0.87$ )	$0.015$ ( $0.67$ )	$0.181^{***}$ ( $14.65$ )	$0.421^{***}$ ( $10.05$ )	$-0.156$ ( $-0.56$ )	$-1.221^{***}$ ( $-4.75$ )	$-0.375$ ( $-1.28$ )	$-1.016^{***}$ ( $-2.88$ )	$-2.448^{***}$ ( $-9.21$ )	$-3.036^{***}$ ( $-9.97$ )
样本数	8894	9418	8894	9418	8894	9418	8894	9418	8894	9418
$F$ 值	89.43	79.33	24.93	56.34	13.83	15.81	16.05	14.29	17.25	34.02
修正 $R^2$	47.60%	40.64%	18.16%	26.24%	6.02%	7.08%	14.52%	12.98%	16.58%	15.68%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 2. 产权性质

从政府资源获取角度来看,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在获取资源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因隶属于政府,自然能获得更多的政府保护和政策性资源。即使国有企业没有开展产业扶贫,也具备韧性发展的资源基础。因此,产业扶贫行为对强化国有企业发展韧性的作用相对有限。而民营企业由于缺乏制度优势,更加依赖后天的努力来维持良好的政企关系,争取更多的政策性资源,以避免在持续发展中可能遭遇的制度障碍。基于此,本文预期产业扶贫行为对于增强民营企业发展韧性的作用将更加显著。本文将样本企业根据产权性质分为国企组和民企组。表10的列(1)和列(2)检验了经济下行期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产业扶贫行为对其获取政府补助的差异化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在国有企业样本中, $PRO \times DURING$ 的系数( $T$ 值)为 $0.004$ ( $0.74$ ),在统计上不显著;而在民营企业样本中, $PRO \times DURING$ 的系数( $T$ 值)为 $0.049$ ( $2.14$ ),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在经济下行期,民营企业的产业扶贫行为能赢得更多的政府支持,而国有企业的产业扶贫行为对其获取政府支持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地,本文分别检验了产业扶贫行为对企业发展韧性的影响,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在经济下行期,民营企业的产业扶贫行为能提高企业韧性,表现为盈利的稳定性更强、业绩增长更快,融资波动更小以及创新水平更高;而国有企业的产业扶贫行为对其发展韧性没有显著影响。

表 10 产业扶贫与韧性发展:产权性质

变量	政府支持		盈利稳定性		业绩增长性		融资稳定性		企业创新能力	
	国企组 (1)	民企组 (2)	国企组 (3)	民企组 (4)	国企组 (5)	民企组 (6)	国企组 (7)	民企组 (8)	国企组 (9)	民企组 (10)
<i>PRO</i> × <i>DURING</i>	0.004 (0.74)	0.049 ** (2.14)	-0.009 (-0.84)	-0.012 *** (-3.11)	0.087 (1.49)	0.118 ** (1.98)	-0.150 (-1.53)	-0.155 ** (-2.20)	-0.236 (-0.94)	0.248 ** (1.92)
<i>PRO</i>	0.011 (1.19)	0.012 ** (2.03)	0.001 (0.42)	0.001 (0.28)	0.017 (0.71)	0.061 *** (2.71)	0.002 (0.01)	0.034 (0.92)	-0.031 (-0.28)	0.064 (0.65)
<i>DURING</i>	-0.071 *** (-3.63)	-0.843 *** (-8.34)	0.005 *** (3.46)	-0.015 *** (-9.80)	0.022 (1.12)	0.045 *** (2.76)	-0.027 (-0.65)	0.030 ** (2.01)	-0.010 (-0.17)	-0.190 *** (-5.17)
<i>SUB</i> × <i>DURING</i>			-0.042 (-1.15)	-0.042 ** (-1.94)	0.024 *** (2.58)	0.873 ** (2.01)	-0.001 * (-1.68)	-0.003 ** (-2.01)	0.014 *** (2.53)	0.012 *** (3.0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	-1.699 (-1.48)	-11.051 *** (-5.44)	0.127 *** (10.48)	0.355 *** (7.92)	-0.220 (-1.45)	-1.261 *** (-5.21)	-0.880 *** (-3.04)	-0.989 *** (-5.99)	-2.190 *** (-6.08)	-2.282 *** (-9.06)
样本数	5 605	12 707	5 605	12 707	5 605	12 707	5 605	12 707	5 605	12 707
F 值	34.61	61.73	18.21	22.35	15.93	27.46	22.72	32.72	26.77	36.97
修正 R <sup>2</sup>	21.25%	24.74%	9.10%	14.16%	5.56%	7.63%	10.53	11.25%	10.62%	5.23%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

### 3. 地区金融发展水平

企业获取金融资本的难易程度和成本大小与其所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当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金融机构(市场)和企业之间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企业能够以更低的信贷成本获得更多的债务资金和权益资金,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当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金融机构(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这会导致市场交易成本增加,企业获取资金的难度加大<sup>[36]</sup>。因此,在金融欠发达地区,经济下行趋势下的产业扶贫行为能够为企业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降低融资约束程度。

表 11 的列(1)和列(2)检验了经济下行期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地区,产业扶贫行为对其融资约束程度的差异化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在发达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中,*PRO* × *DURING* 的系数(T值)为-0.150(-0.40),统计上不显著;在欠发达组(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中,*PRO* × *DURING* 的系数(T值)为-0.050(-2.04),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在经济下行期,当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产业扶贫行为能为企业争取更多资源,缓解融资约束。进一步地,本文区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分别检验了产业扶贫行为对韧性发展的差异化影响。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在经济下行期,当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产业扶贫行为能提高企业韧性度,表现为盈利的稳定性更高、业绩增长更快、融资波动更小以及创新水平更高;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产业扶贫行为对其韧性度并无显著影响,与预期相符。

表 11 产业扶贫与韧性发展:地区金融发展水平

变量	融资约束程度 KZ		盈利稳定性 STDROA		业绩增长性 DSLAE		融资稳定性 STDLEV		企业创新能力 PAT	
	发达 (1)	欠发达 (2)	发达 (3)	欠发达 (4)	发达 (5)	欠发达 (6)	发达 (7)	欠发达 (8)	发达 (9)	欠发达 (10)
<i>PRO</i> × <i>DURING</i>	-0.150 (-0.40)	-0.050 ** (-2.04)	-0.005 (-0.65)	-0.010 ** (-2.41)	0.006 (0.06)	0.133 ** (2.07)	-0.098 (-0.47)	-0.219 *** (-2.79)	0.238 (0.67)	0.094 ** (1.97)
<i>DURING</i>	0.019 (0.36)	0.345 *** (6.48)	-0.011 *** (-7.29)	0.002 (1.06)	0.171 *** (12.85)	0.017 (0.97)	-0.089 ** (2.29)	-0.030 (-0.75)	-0.240 *** (-5.22)	-0.135 *** (-2.86)
<i>PRO</i>	-0.108 (-0.72)	-0.129 * (-1.71)	-0.002 (-0.84)	0.001 (0.07)	-0.040 (-1.13)	-0.057 * (-1.77)	0.023 (0.29)	0.045 (1.17)	0.076 (0.59)	-0.043 (-0.49)
<i>KZ</i> × <i>DURING</i>			0.002 *** (3.54)	0.002 *** (5.72)	-0.001 (-0.36)	-0.013 *** (-3.52)	-0.002 (-0.25)	0.018 ** (2.09)	0.029 *** (2.53)	0.028 *** (2.6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	6.791 *** (4.17)	6.300 *** (11.58)	0.164 *** (12.07)	0.193 *** (12.15)	-0.118 (-0.31)	-0.746 *** (-4.21)	-0.649 (-0.75)	-1.086 *** (-3.52)	-2.914 *** (-8.39)	-2.784 *** (-6.16)
样本数	9 584	8 728	9 584	8 728	9 584	8 728	9 584	8 728	9 584	8 728
F 值	275.54	287.01	30.52	23.82	26.16	19.77	5.13	10.68	13.62	16.63
修正 R <sup>2</sup>	53.03%	53.45%	10.54%	8.17%	10.55%	7.83%	2.06%	4.72%	5.21%	6.23%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

## 八、研究结论

本文以企业发展韧性为研究出发点,选取 2016—2020 年沪深 A 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产业扶贫行为对于企业发展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与未参与产业扶贫的企业相比,参与产业扶贫的企业在经济走势下行期会表现出更强的发展韧性。第二,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企业通过参与产业扶贫能笃实实业经营、赢得政府支持、缓解融资约束,从而为企业获取更多竞争优势和资源,以抵御外部经济下行压力,表现为更强的发展韧性。第三,在实体投资环境不佳、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以及民营企业中,产业扶贫对企业发展韧性的积极作用更加显著。

本文研究结论进一步肯定了企业开展产业扶贫的积极效应。已有研究表明,产业扶贫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特殊方式,能够降低企业风险,提高企业经营业绩。本文的研究显示,参与产业扶贫有助于增强企业发展韧性,这对于当前鼓励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对于政府而言,应加快推动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的实施,加快出台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的实施细则。应构建开放、透明的竞争机制,鼓励有实力、有优势的企业参与到乡村振兴来并给予明确的政策预期。(2)对于企业而言,参与乡村振兴不仅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也能够经济下行期提升企业发展韧性。因此,参与乡村振兴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 参考文献:

- [1] ZHANG Y L, ZHOU X Y, LEI W. Social capital and its contingent value in poverty reduction: evidence from western China [J]. *World development*, 2017, 93(1): 350 - 361.
- [2] JOSE S, RUIZ-MARTÍN C, JUAN NEBRO J, LÓPEZ-PAREDES A. Why can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not be measured? [J]. *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3, 24(2): 199 - 220.
- [3] TASIC J, AMIR S, TAN J, et al. A multilevel framework to enhanc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J].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020, 23(6): 713 - 38.
- [4] 尚铎, 范黎波, 原东良, 等. 国际化战略、组织韧性与环境不确定性——以三一重工为例 [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2021(10): 487 - 499.
- [5] 张少峰, 徐梦苏, 朱悦, 等. 技术创新、组织韧性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3(7): 81 - 92.
- [6] ZEYA H, HUILING H, HYEYOON C, et al. Building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wit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J]. *Journal of service management*, 2023, 34(1): 147 - 171.
- [7] 卢现祥, 胡颖. 数字化同群效应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J]. *产业经济研究*, 2024(5): 44 - 56.
- [8] 郝素利, 张丽欣. 政府审计、内部控制能有效提升组织韧性吗? [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2(6): 10 - 20.
- [9] 张梦桃, 张生太. 关系网络对组织韧性的影响——二元创新的中介作用 [J]. *科研管理*, 2022(7): 163 - 170.
- [10] 赵思嘉, 易凌峰, 连燕玲. 创业型领导、组织韧性与新创企业绩效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1(3): 42 - 56.
- [11] 郝颖, 李雪轶, 倪娟, 等. 社会责任履行、信任凝聚与企业发展韧性——基于经济不确定性场景的研究 [J]. *财经研究*, 2024(10): 94 - 108.
- [12] 胡海峰, 宋肖肖, 郭兴方. 投资者保护制度与企业韧性: 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J]. *经济管理*, 2020(11): 23 - 39.
- [13] 刘莉亚, 周舒鹏, 庞元晨, 等. 扶贫的企业力量——来自中国上市公司扶贫效果的证据 [J]. *财贸经济*, 2022(1): 138 - 152.
- [14] 徐维祥, 周建平, 郑金辉, 等. 多尺度网络视角下企业产业扶贫资源跨区域配置及减贫效应 [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10): 2703 - 2719.
- [15] 甄红线, 王三法. 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影响企业风险吗? [J]. *金融研究*, 2021(1): 131 - 149.
- [16] 张曾莲, 董志愿. 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绩效的溢出效应 [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0(5): 86 - 98.
- [17] 邢小强, 汤新慧, 王珏, 等. 数字平台履责与共享价值创造——基于字节跳动扶贫的案例研究 [J]. *管理世界*, 2021(12): 152 - 176.
- [18] 岳佳彬, 胥文帅. 贫困治理参与、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视角 [J]. *财经研究*, 2021

- (9):123-138.
- [19] 钱爱民,吴春天. 产业扶贫改善了扶贫企业的资产结构质量吗?——基于企业金融化视角的分析[J]. 宏观质量研究,2023(2):24-41.
- [20] 邓博夫,陶存杰,吉利.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缓解融资约束[J]. 财经研究,2020(12):138-151.
- [21] 何康,项后军,方显仓,等. 企业精准扶贫与债务融资[J]. 会计研究,2022(7):17-31.
- [22] 潘健平,翁若宇,潘越.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共赢效应——基于精准扶贫的视角[J]. 金融研究,2021(7):134-153.
- [23] 董竹,张欣. 参与精准扶贫与企业创新——基于外部融资视角的分析[J]. 南方经济,2021(10):48-65.
- [24] 祝丽敏,赵晶,孙泽君. 社会责任承担能提升企业信心吗?——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证研究[J]. 经济管理,2021(4):71-87.
- [25] 李世刚,鲁逸楠,章卫东.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J]. 证券市场导报,2023(4):24-32+41.
- [26] 蒋永甫,龚丽华,疏春晓. 产业扶贫:在政府行为与市场逻辑之间[J]. 贵州社会科学,2018(2):148-154.
- [27] 毛新述,周小伟. 政治关联与公开债务融资[J]. 会计研究,2015(6):26-33+96.
- [28] 马文涛,张朋,温军. 政府隐性担保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来着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中国经济问题,2023(2):67-82.
- [29] 钟凯,程小可,张伟华. 货币政策适度水平与企业“短贷长投”之谜[J]. 管理世界,2016(3):87-114+188.
- [30] 白云霞,邱穆青,李伟. 投融资期限错配及其制度解释——来自中美两国金融市场的比较[J]. 中国工业经济,2016(7):23-39.
- [31] 易玄,吴蓉,谢志明. 产权性质、企业精准扶贫行为与资本市场反应[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0(2):98-104.
- [32] 黄金波,陈伶俐,丁杰. 企业社会责任、媒体报道与股价崩盘风险[J]. 中国管理科学,2022,(3):1-12.
- [33] 于文超,梁平汉. 不确定性、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经营活力[J]. 中国工业经济,2019(11):136-154.
- [34] 王红建,曹瑜强,杨庆,等. 实体企业金融化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2017(1):155-166.
- [35] 于连超,张卫国,毕茜. 产业政策与企业“脱实向虚”:市场导向还是政策套利?[J]. 南开管理评论,2021(5):128-142.
- [36] 马红,侯贵生,王元月. 产融结合与我国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基于上市公司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2018(3):46-53.

(责任编辑:孔群喜;英文校对:谈书墨)

## Do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Resilience? The Example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DI Lingyu , HOU Tingting , XU Yizh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emphasiz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firm efforts to implement the national strategy in a particular period. The approach helps change the appearance of areas in which poverty-alleviation efforts are made and is expected t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is approach will also improve the resilience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where the economy faces downward pressure. This paper selects a sample of A-share listed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16 to 2020 and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on the resilience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ms actively engaged in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exhibit greater resilience during economic downturns. This resilience is mainly enhanced through consolidating the industrial foundation, winning government support, and alleviat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unfavorable investment climates, regions with weak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among private firms. This study validates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corporate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a resilience perspective.

**Key words:**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developing resilience; financing constraints; commercial credit